

·信息·

《中国药用植物志》书评

《中国药用植物志》为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项目、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,自2008年6月正式启动,前后历经13载。在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下,由北京大学药学院艾铁民教授牵头并精心组织全国植物学和药学500多位专家学者,克服各种困难,坚持不懈,久久为功,终于天道酬勤,结成硕果。

我曾思考过中医药文化产生的原因,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具备“人杰地灵”的基本条件。先说“地灵”,我国幅员辽阔,生态条件多种多样,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中孕育出极为复杂的植物区系,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,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产生的自然地理条件。再说“人杰”,中华民族勤劳、智慧,善于积累、总结实践经验,涌现了很多杰出的大医学家和大药学家,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产生的人文条件。这些医药学大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珍贵的医药学典籍。在中医学方面,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《黄帝内经》,提出了“治未病”的预防思想,汉代的《伤寒杂病论》创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,现在可考证的中医古籍就有6000余种。在本草学方面,汉代就有了《神农本草经》,南北朝梁代陶弘景编著了《神农本草经集注》,明代李时珍编著了《本草纲目》,清代赵学敏编著了《本草纲目拾遗》,这些都是本草学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,现存的本草古籍就有400余种。这些医药学著作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同疾病抗争的经验总结,是蕴含丰富医药学实践经验和独特医药学理论的知识宝库,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中医药是科学,必然要与时俱进,其发展方向必定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生命科学交叉融合,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并展现其独特治疗魅力。植物分类学的开山鼻祖是瑞典的林奈,他在1753年出版了《植物种志》,采用二名命名法,标志着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兴起。中国清代吴其濬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(1848年)开“考证学”之先河,致力于考证植物“名”与“实”相符,成效显著,同时也成为后来考证药用植物的重要典籍。现代分类学传入我国较晚,开拓者是1915年从美国留学回国的钱崇澍教授。尔后“本草考证学”日渐兴起,目的是将“本草”中的品种与现代分类学的物种相联系和对应,使药材的基原精确,保证用药无误。“本草学”和植物学的融合逐渐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药用植物学体系。1949年以后,开展了3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(第四次正在进行中),出版了《全国中草药汇编》《中药大辞典》《新华本草纲要》等重要著作,汇总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结果的《中国中药资源志要》记载中国药用植物资源11020种,这些工作进一步促进了分类学和本草学的融合。

随着21世纪初《中国植物志》的完成,编写《中国药用植物志》时机已成熟,于是《中国药用植物志》应运而生。本书以现代国内外多数植物志采用的Engler植物分类系统为纲目,广集中国各民族有记录的近12000种药用植物,融合最新的化学、药理学、药材学的研究成果,与准确的墨线图 and 精美的彩色照片相对应,极其利于学术交流与应用,堪称完成了本草著作的创新和现代化,无愧为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的基础性工程,可谓现代版的《本草纲目》,意义自然重大。

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,伴之而来的疾病谱变化、人口老龄化、生态环境状况等改变,加之化学药物的毒副作用在诸多方面进一步显现,使回归大自然的理念深入人心,使用天然药物来医疗保健养生渐成趋势,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好中药现代化的工作,以现代科学技术的理念和方法,着眼于“天人合一”的大格局,加深对中药和药用植物的研究工作。在本书收录的近12000种药用植物中,中药材常用的仅有1000种左右,研究资料也相对充分,但仍有多种类在现代研究方面需要填补空白,研究的深度需要加强,研究的领域需要拓展,只有这样中药现代化的工作才能卓有成效,也为中药国际化、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奠基性和开拓性的贡献。面对中药现代化、国际化的伟大目标,要做的研究工作还很多,相关学科的学者们仍需精诚协作,努力再努力!

本书同时考虑到药用植物资源的永续利用,列出中国需要保护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,对这些植物一定要通过人工栽培技术加以繁殖和利用,既能够保护生物多样性,又符合绿色发展的理念。全书在拉丁学名印刷体标准化使用方面也为相关学科做出了榜样,即学名的正名用黑正体,异名用白斜体,订正了国内期刊和著作上拉丁学名一律用斜体的情况,避免了在学术文献中同时存在正名和异名难以区分的缺憾。

《中国药用植物志》对于中医药科研、教学、临床、生产、营销、国际贸易和药政管理人员是有重要借鉴作用的参考工具书,对国内外大众了解和应用中国传统医药学知识也有极好的促进作用。

王文采
中国科学院院士
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